

娼妓、寄生蟲、與國家女性主義之「家」

丁乃非

謝孟蓉、陳雅華 譯

1 . 唉，老鼠又回來了

唉，老鼠又回來了。牠們啊，就像那句格言所說的，一直就已經在那兒了。建築的一部份。錯誤、波浪狀的線條、混淆、曖昧，是知識的一部份；噪音是溝通的一部份，也是房子的一部份。但它們是否房子本身呢？

我這個世代之前的理性主義者，他們和理性的關係就像衛道者和美德之間的關係，比較重視道德而非深入研究，比較是一種社會性策略而非智識上的。我想這跟某種潔癖相關聯。那我們該把髒東西擺到哪兒去呢？

(Serres 1982: 12-13)

我把我的故事編排成一種寄生蟲模式，寄生在兩組引言之上，這兩組引言來自於某些言論，而今這些言論已可被視為建制台灣「國家女性主義」論述過程中的初始成形階段（註 1）。在我寫作這篇論文時，國家女性主義之「家」還在建造的初期，在本論文裡，我將檢視國家女性主義論述中兩個已出版並廣為流通的重要篇章。這裡第一篇要觀察研究的是林芳玫的文章，於 1998 年 6 月發表在一個相當重要的文化期刊中。林文環繞著婦運內部對於台北市 128 位公娼爭取緩廢

兩年的爭議，可視為婦運認同政治對於公娼議題的主要宣告與評論。林文的書寫可以看成是性別政治女性主義者及婦運陣營對於自身批判性及政治性位置的宣示。林文的要旨在於分析評論婦運內部認同政治產生的轉變；認同政治在文中被視為是分屬兩個分歧與對立陣營的：一方是由一群性別政治女性主義者和婦女團體組成，她們目前熱中與各種新興的追求民主、進步之國家力量相結盟，來發展一種大眾路線的政治抗爭，也因此移轉其關注到所謂的「普及結盟路線」之上，認為這樣的路線在關注如「托育、老人安養、社區、健康」等議題的同時，將可「吸引女性與男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林這篇文章中所名為「他者」的，則是緊貼在婦運組織與議題內部和邊緣上的性解放陣營。性解放陣營在文中是指某些關心性慾及性議題的人士與論述，乍看之下，文中描述的其特性、政治位置、與論述內容，是既不具互補力也不具生產力。這些人被視為是在利用女性主義、婦女運動和娼妓（公娼），來推動他們自己渴望的那些不夠嚴肅的所謂「後現代表演」或「裝模作態」的政治。

容我在此先說明我並非一個中立的解讀者，因為我完全與文中所提的破壞者陣營緊密牽連著。不過，我今天想做的是聚焦在林芳玫的立論中兩處看似不重要的小細節或比喻，我想試著論證這些比喻如何重要且意義重大，並且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兩（加一）個陣營所處位置有一種結構上的不對稱；兩者位置主要被描述成全然的敵對相爭，各自在壯大自身的同時也鏡像般映照出對方，互相醜化為魔鬼。以上將是我根據林文論述中的引言所作的第一個論證要點（位於第二小節）。

我其次要論證的是，林文將女性主義與婦運內部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這樣的設定不但掩蓋了林文中兩陣營的定位和對於兩陣營關係的理解有結構上不對稱的事實，也掩蓋了其中的階序和包含

邏輯。而主要得到女性勞工組織奧援的公娼運動以及公娼本身的聯盟組織，也在這種設定之下被擺放在兩者之外的第三向度空間，完全斷然地存於「這個」婦女運動和議題所能想像的邊界之外。在這個觀點內，新生的公娼運動，與女性、男性身體（大部分來自勞工運動和酷兒、男、女同志團體）組織結盟的新集結力量，是沒有位置也沒有形體的。他們只不過形成了一幅「空白銀幕」，好讓人看到國家女性主義者在某個歷史時刻上轉向了「更宏大的」制度與官僚行政層次的問題爭議，也讓人看到性解放陣營寄生蟲的扭曲怪相。林的文章是這樣說的，「廢娼派並不奢望立即、全面的消滅所有性產業與工作，反而主張對性產業加以管理規範，而其管理規範的對象不是娼妓，而是產業、媒介者、嫖客。這不僅包含了娼妓除罪化的主張，更進一步指向懲罰加害者」（林芳玫 1998: 60）。請注意，在此處，性工作者甚至是從管理規範的對象中如何地消失不見了。他們被假設能夠由這個先拿老鴿和嫖客開刀的新管理新規範中得利，而最終整個性產業將被全面的消滅。

第二組引文（第三小節）引自 1997 年初刊登的一篇專訪（註 2）。受訪的劉毓秀是以「國家女性主義」最主要的倡議者和理論家身分出現在這篇訪談中，「國家女性主義」這個詞第一次被使用到就是在這篇專訪裡。這個專訪也為林芳玫的文章所引用，認為這是性別政治女性主義者和婦運組織陣營對於採用「國家女性主義」之策略和目標的決定性宣示。因此，如果劉毓秀的訪談被視為是一篇奠定基礎的理論宣告，那麼林芳玫的論辯則更進一步把該訪談裡國家女性主義的位置與性別政治的女性主義及婦運組織做了接合。我這樣的說明是為了指出這接合並非來自我的想像，並且就我所知，這樣一個在當時似乎還不成熟的接合，目前已經有發展得相當明確的態勢了。

我在解讀林這篇理論／政治的立場聲明時，會把焦點集中在話

語中的比喻上面；因為言語上的比喻經常是說明某種多層思考的例證，其中包含的部份層次只能以影子的影子或罔兩稱之——就是某些不易褪去的意識型態之影外微陰。我的解讀裡至少包含了兩種罔兩，兩種都不太辨識得出來也不被允許出現。一方面，這兩種罔兩正是一種寄生的技巧策略與階序關係形式的體現，也因此在此稍晚出現的認同政治評論中（即林芳玫該篇文章），國家女性主義者須為文加以撻伐，並且歸類指稱其為他者。寄生蟲式的抗爭技巧在國家女性主義陣營裡幾乎辨識不出來，但我要在此提出的論證是，這種技巧也正在該陣營裡運作：至少在她們想像女性主義者先隱瞞真實身分行事，而與家庭主婦或女性私領域／家庭內的力量結盟，以便後來接管整個國家時，這種寄生蟲技巧就正在運作。另一方面，這其中又有一種幽靈的重現（但必須區分這些具優勢的鬼和那些反抗的、少數的罔兩／影不同），這幽靈是一個怪異的類儒家（quasi-Confucian）女性主義主體，在她成功「修成」女性主義之身，也成功完成齊家之業後，將把她抱持的道德質性與服務態度擴及到國家和整個天下。這一新的國家女性主義之「家」，因此是以同心圓式向外擴張放射狀的人事物新秩序作為其幽靈結構。結構的中心站著一位女性知識份子（也就是哲學女王），身在家庭主婦的影裡，她吞佔翻轉掉了舊有的威權父權結構，由內到外由上到下徹底地翻轉它，這，就是新的國家女性主義之「家」。

2. 寄生蟲與空白銀幕

性解放運動與強調性別的婦運，兩者自 1994 年以來迭有衝突，不只是因為二者有不同的論述主張，更因為二者處於共同的政治空間而產生對同一議題的詮釋權之爭。

二者之所以會處於共同的空間而衝突不斷，正是因為性解放派不願開創自己的組織，反而寄望於性別路線的婦運組織——尤其是婦女新知基金會——提供物質資源與象徵層次上的正當性來為性解放背書，於是性慾政治之性解放派緊貼住性別政治之婦運組織，視其為宿主，產生數次衝突後，於公娼事件中達到緊張關係的高峰。

（林芳玫 1998: 58）

做為認同政治與差異政治的性解放路線，在同／異的矛盾中顯現出三方面的同化傾向。第一是將性工作等同於其他工作，泯滅從良／從娼的界線；第二是拒絕將性議題視為少數的、特殊人的利益，主張它是普遍的公民權、人權議題，攸關政經體制社會正義；第三是迴避將性解放議題視為獨立自主的範疇，反而將其緊貼住性別路線，視其為宿主，堅持要在女性主義與婦運的框架下談性解放議題。雖然有這三方面的同化傾向，但性解放路線在提及主流社會的紀律、規訓、管理、監督時，又十分排斥。

（林芳玫 1998: 78）

公娼事件猶如一幅空白的銀幕，不同陣營的婦女團體（性解放／性批判、體制內／體制外、大眾／分眾）將她們對各種議題的看法投射到這張空白的銀幕上，映照出斑斕駁雜的圖案。

（林芳玫 1998: 80）

不同陣營的女性主義者互為倒影、互為他者。

（林芳玫 1998: 80）

我所舉出的前兩段引文正是兩次寄生蟲隱喻出現之處，都是經由一種含蓄政治的方式表達（註3）。寄生蟲從未被直接地指稱出來，而是經由披露其相對體的方式展現；性別女性主義者與女性主義成了受害的宿主，好像成了被性慾政治陣營寄食的犧牲者。這個含蓄的比喻用法標示了該篇文章的一個基本矛盾：如同最後的引言所說，該文章的性別政治位置一方面會想把自身和其對手（性慾政治路線）看作同樣地彼此映照、相互醜惡化，同時壯大各自的主體；在此同時，又立即且不斷重複著一種比喻，暗示這兩個敵對陣營間的關係一點也不平等相對：一個是宿主，而另一個是寄生蟲。

如果說性別政治女性主義者與婦運被比喻成宿主，而性慾政治擁護者被視為是寄生蟲的話，我們便可以見到，這兩種位置和分類之間先天上的不同「本質」有一個清楚的區隔。兩者之間的不同，以一般常識來看，宿主與寄生蟲在大小和有機組織上很不相同，宿主常常長得比較大，視覺上也會感受到它的組織較為完好；寄生蟲卻經常很微小而難以覺察。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宿主不只是讓人以為佔據了較大空間，在時間上，也總被視為是走在前端、先於寄生蟲就已存在的。藉著這樣一個寫作手法或比喻，林文馬上能輕易地凝聚兩種觀感：性別女性主義陣營在人數上較多之外，在歷史時間上也是優先出現的。所以她們有此「權利」宣稱自身為宿主，宣稱自己是「家」，也就是女性主義與婦運的「家」。其中的重點在於，現在是「家」重新建造更改結構的時刻；在這個房子面臨全國性的改建時，屋主是誰便大有關係了，誰在新的計畫階段有決定權，誰有權決定空間的安排分配，都十分關乎緊要。將女性主義分成宿主與寄生蟲兩種——可以說是具有暴力的認識論邊際效應的「分類」（“classificatory”）計策——這一點卻變得完全無關緊要了。

在林芳玫的陳述中，寄生蟲寄食宿主有兩種方式，其一是寄生

蟲長期隱藏在婦運組織裡，吸食她們所掌控的資源，特別是在全國上下對於人身安全這樣的婦女議題皆有所認識之時（1997 至 1998 年間）。寄生蟲被認為不斷吸食宿主資源，安安全全地隱藏依附在宿主的身體組織之上。其二是在任何看來重要且意義重大的事情上（就議題與意識型態來說），寄生蟲似乎都和宿主有著共同的興趣，但其中重要的不同點在於，滋養宿主壯大的成份到了寄生蟲身上，卻被看成是偷取來的，甚至尤其在這寄生蟲也仰賴同樣的食物來生存之時。因此，寄生蟲被視為是外於宿主的一部份，是一個外界組織體或附屬物，而非宿主身上整體的一部份。由宿主的觀點看來，可怕之處就在於寄生蟲似乎總在模仿宿主本身的一些興趣、胃口、和需求。這樣詭異畸形的模仿，可怕在兩者間形體的親密，和某種不受歡迎的接近和相似：這寄生蟲利用我的身體和牠的材料，爭食著我的食物。

寄生蟲是甩不掉的，牠們靠得太近，但也不夠相似；然而，牠們也不會一個個慢慢死去（寄生蟲常常比宿主多得多，但那或許也是某種偏執的認知）。牠們與我的身體系統內部相連，卻又不變的附在我身體之外。要去想究竟我的範圍終止在哪裡，而寄生蟲又從哪兒開始滋長，真是件困難又噁心的事。林芳玫說，要是寄生蟲能夠自己獨立，自己質變成了宿主，也只有到那個時候，兩個女性主義陣營才有可能發展出平等友善的關係。要是這種混亂的生物有機體內的血管關係能夠停止有多好。

林文所構連起來，兩陣營不平等卻又註定兩者身體（宿主／寄生蟲）無法分割的關係，令人驚訝卻也並非偶然地想到，它在某種程度上令人聯想起 Louis Dumont 對於「階序」的看法。當然 Dumont 是試圖去描繪和理論化他所謂的印度卡斯特（註 4）的象徵準則，此一階序準則指的是「一個類別（高級者）含括另一個類別（低級者），後者則又把前

者排除在外。」（註5）（Dumont 1970: 241）。「在較高級的層次上有統一；在較低級的層次上有分別……有互補，或對反。而階序即是把與不同層次有關的性質結合起來。在此定義下的階序，互補或對反，即含括於較高級層次的統一裡面。」（註6）（Dumont 1970: 242，底線為筆者所加）。換句話說，就如同 Dumont 進一步所說明的，由於不同的階級牽涉進來，這之中有某種同時並存的一致與矛盾：就一個先存的、含括他者之統一和秩序的意義來說，有種一致性存在著；而矛盾性則是就低層次、被含括者的意義來看，低層次同時排除卻也完全被含納進高層次裡。然而，在一篇附錄裡，Dumont 檢視了種族歧視和其在現代社會（例如美國）所據稱擁有的「社會功能」，Dumont 說：

平等與階序事實上並不是像只考慮價值觀念時可能會令人以為的那樣機械性的相互對立：對立中不被尊崇的一端仍然還是存在，兩端彼此含括，彼此支持。〔……〕平等主義的理想常常會毀壞此項結構關係，其結果就是目前最常被放在「社會階層」的名下所研究的現象。首先，結構關係被倒反過來：平等含括不平等，而不是被含括於一個階序之中。其次，產生一系列的轉形，可以把這些轉形綜述成對階序格局的壓抑，使人意識不到：代之以各種各樣不平等的網路，種種事實上是——而非權利上應如此——的不平等，數量上的和程度性的不平等，而非質量上與斷層性的不平等。

（Dumont 1970: 265）（註7）

林芳玫對於兩女性主義陣營宿主與寄生蟲的比喻，既成功地將

兩個層次的關係以及其分別的時間空間分布做了緊密結合之外，她也十分精準地把它們撬分開來。就第一個層次來說，宿主是一個有機的政治實體（從婦女運動到國家女性主義）；它是先存的「自然的」整體，含括了的確是或一定是較低等級的、依賴這整體的一切事物（性慾的議題／女性主義者）。在此一層次上，林的比喻驚奇地令人想起某種前「現代」的階序關係模式。然而在另一個層次上，這種「自然的」依賴與含括被含括關係，卻也同時被認為必然是某種變態、噁心的關係，或者在已經來臨的現代民主國家的時間空間中被認定成「不自然」的發生，因為在那樣的國家裡，盛行著平等關係和自主個人主義之意識型態，而階序的存在則被否認。因此會出現這樣的勸戒聲：寄生蟲也該去獲取一個「平等」的獨立自主地位，不要再去吸食（母性的、母質的）宿主。這種可能曾是有機或自然階序性關係，其中的變態性在於：原本是被他類含括的類別，是如何被擬想成已經自己具有含括他類的潛力和威脅性（就如同想像寄生蟲能夠一步步吞噬掉宿主，造成後者的滅絕一般）。用這樣的意象來比喻兩個女性主義陣營，立即就能區分出兩者之間的階序性；於此同時，卻又利用寄生蟲的變形身體相對於受害宿主，來強調並詳述其先天的變態和不健康的本質，藉此否認某種剩餘的（前現代）階序邏輯的存在與運作。

林的文章中也曾兩次提及一個第三向度空間，它被認為只是一個平面，是爭執不休的宿主與寄生蟲藉以投射或放大而在上面看、聽見彼此的一個空白銀幕。這一空白銀幕標示出了歷時九個月的公娼運動其訴求與行動所在的位置。公娼和她們的抗爭運動在國家女性主義之「家」裡面的鏡中看來，甚至不是一個能被映照看見的怪物實體，那麼她們一定是佔據了鏡子的另一面，完全不會映射影像的那一面。她們在鏡子的陰影之中。也或許，對於台灣的性別政治女

性主義來說，公娼們所佔據的是一個無身分、或無從辨識身分者（non-identity, or non-recognizable identity）的位置（註8）。她們是影子的影子，是根據「身分即實質」的觀點而言幾乎看不見的罔兩。

林芳玫的長篇文章似乎意在分析批評女性主義不同陣營和婦運內部的身分認同，不論是在台北公娼運動之前或抗爭期間（註9）。我認為在實際效果上，林的文章建立起兩個——且只有兩個——女性主義陣營互相敵對競爭在對抗中彼此映照的事實；然而這種設定方式掩蓋同時卻也揭示了兩陣營（宿主和寄生蟲）之間存在的某種結構與權力上的不對稱，某種階序關係的差異。十分重要的是，宿主的比喻法並不能夠解釋在這個假想的特定戰場內，公娼們是處在什麼位置、何種地位。公娼抗爭頂多只能是一個平面，一幅空白銀幕。很顯然，在這篇「評析」之中，公娼們佔據著一個沒有位置的位置，她們無從辨識，是不具身分的身分。正由於林文在比喻和結構的輪廓上描繪了交戰的女性主義認同位置，並且將公娼及其抗爭貶抑到無身分者的位置，更讓人覺得必須去釐清這些位置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只去確認或否定某些身分及不具身分的身分。

這也是為什麼在此刻，我想承接上文而來的思考方向，主張此寄生蟲意象也可以顯得恰當而具有生產力；就此一意象所代表的意義而言，它質疑了宿主這個想像所帶有的整體性、歷史優先、以及堅實特質。寄生蟲與寄生關係或許是另一條路徑，來重新規劃一種不以宿主或身分認同為中心的政治。為了把我試著要說的論點弄得更清楚些，我想從另一篇演講切入，該演講大致切合到相同的問題，不過是從另一種地理與理論的政治位置出發。

在一場名為「性別與國族」的主題演說裡，Tuija Pulkkinen (1989) 對於 Gayatri Spivak 的主張中之政治層面（而非哲學層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她反對 Spivak 「身分認同政治……到哪兒都不是好事」和「身分認

同政治之中有個騙局」的說法。Pulkkinen 反問：如果認同政治是要去實踐 (doing)，而非只「是」(being) 某種身分，是被建構出來而非原本就存在的，這樣的政治還總是壞事嗎？「難道寧願追求非身分認同 (non-identity) 的政治嗎？」她的答案是「否」：「因為『認同』和『差異』經常是互相指涉的，所以非認同的政治也就等於無差異政治。如果你對差異感興趣，你就也該對認同感興趣。」Pulkkinen 用「芬蘭人」和「女人」做例子，下了這樣的結論：「身分認同沒有什麼絕對的意義，但卻會在特殊脈絡下經由重述和引用被建造出來。所以，唯一有趣的是個人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宣稱自己的身分。」Pulkkinen 說，身分的宣稱通常出現在反霸權抗爭的脈絡下，來對抗排他的普同化分類 (exclusive universal categorizations)。因此，「如果大家都注意到這個事實——也就是世上沒有相同無二致的事物，身分並不具備本質的意義，所有的身分其實都是多樣的、被重述被引用的，所有身分都是隨機應運而生，有脈絡且被建構的，它們不是自然存在而是被製造出來的——那麼在這樣的情形下以身分認同之名來『搞』政治就不會有危險。」

然而，正是在以女人的女性主義者身分之名來從事政治這樣的做法之中，林芳玫的文章一邊描述，一邊無意中洩露出，倒不是騙局，而是此時此刻性別政治女性主義的身分政治和婦運之中的吊詭。這個脈絡中的吊詭，指的不是利用反覆述說相似性來掩蓋差異；而是在於藉由同時否認又主張兩者（宿主和寄生蟲）之間不平等的結構和權力關係，林文立即假定了一個只存在於可辨識的女性主義身分之間的階序性平等。然而，其中的騙局就隱藏在台灣史無前例的公娼運動「空白螢幕」所投射出來的影子裡，公娼們努力對抗新近形構成的「女性主義」霸權，此霸權下的普同化分類含括的「娼妓」身分是被污名化了的，含括的「女人」身分是有特定限制的。在林芳

玫的想法中，身分認同政治比較不是本質化的，不是要建立一個真實原創的（女性主義者）身分；而是以實體為中心的（substance-centered），要比喻式地把性別政治和國家女性主義位置具體化為此刻在台灣唯一一個行得通的位置（position）。只有這個位置擁有（或有資源來建造）自己的房子，而這個房子正在經歷全國性規模的重要結構更改和擴建。因此，林芳玫的論證並非試圖假定某種本質的、真實原創的女性主義女人位置；相反的，透過建構宿主與寄生者的對立，她的文章建立了一個實體取向（substance-oriented）的，相對於寄生蟲的、衍生的、次要而道德薄弱的位置。它暗示了處在那些還沒獲得宿主地位和規模位置的，都應該以那個已經就定位、有個人／體性（individuated）、獨立的宿主為學習的模範、榜樣。

3 . 治理國家，併吞政府：哲學女王

主婦有主婦的價值觀，我並不急著去挑戰她們，相反地，我要求自己全心全意與她們合作，絕對避免陷入女人之間相互否定的邏輯。我的原則是，不管妳是怎樣的女人，我只管把權力送到妳手上。對我而言，婦運最重要的一步莫過於此——讓人成為權力的主體——這件事本身有著絕大的意義。

（劉毓秀 1996: 21）

去觸動家庭主婦，組織這些媽媽們，我選擇先不直接去攻擊家庭父權，因為它太有正當性，與女人之間情感上的勾連也太深，如果硬撞，會搞得頭破血流，難有收穫。於是我採行繞道的方式，朝重新定義國家入手，改

變國家的性質（這繞道既是策略也是目標，詳見下文），嘗試以國家女性主義包圍家庭父權，藉女人在公部門集結累積的力量改變公私領域的性別權力邏輯。

（劉毓秀 1996: 23）

我現階段正努力從事的，不是打破公私領域的劃分，而是去逆轉它，讓私領域以一種更具攻擊性的姿態去吞併公領域；重新定義國家，賦與國家機器一種正面的意義並促動它良性質變成為一個照顧者，由女人出面治理它。讓整個公領域變成私領域，讓國家社會成為照顧者，讓國變成家，變成人民之家，讓國從嚴峻的父轉變為慈愛的母，以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為存在的根本，讓做慣了獨裁者與精神導師的 Philosophy King 退位，由 Philosophy Queen 上位掌權，讓女人掌握國家權力，成為社會、國家、世界的照顧者。（註 10）

（劉毓秀 1996: 23）

我認為不但要與國家機器纏鬥，改變它，還應該滲透其中嘗試主導它的運作模式與方向，所謂「國家女性主義」，就是以女性主義的思考與力量介入，促使國家本身去扮演基進者的角色，以人民的需求為要務，主動將資源分配給弱勢的族群，亦即，由國家出面去對抗既得利益者。

（劉毓秀 1996: 24）

在這個時刻選擇從國家女性主義的角度去思考婦運實踐

的可能與方向，和政治環境的變化有很大的關係。……這之中，由陳水扁執政的台北市政府，給國家女性主義這樣的實踐路線一個上場磨練、舞刀弄槍的機會。

（劉毓秀 1996: 24-25）

這篇訪談中劉毓秀所描繪出的遠景的確十分宏大，國家女性主義在這篇訪談裡以及其他地方都清楚地陳述了它的目標和手段：女性主義是致勝的利器，政府機器則是戰鬥目標，它非得被接掌過來不可，而且一旦交入女人的手中，女人之治不但會改變機器自身，而且也會立即同時改變主流的父權邏輯。然而，是誰在發言和運籌帷幄？這篇文章的主體發言位置在哪裡？這個問題只能透過思考家庭主婦的位置才能一探究竟，做為國家女性主義的催化主體（catalyst subject），她們被賦予高度的重要性。

家庭主婦的位置，就是改革將從此開步走的優勢處所（the privileged site）。她們被擬想為這一個接管政權的先鋒，根據這篇訪談，原因在於考慮到台灣家庭父權機制之頑強不屈，所以如果家庭內的女人開始「動作」，那麼一個「更全面的婦女運動」就會從此展開。但是為了避免因著「女性主義啟蒙者」的意識型態，而使這個運動陷入「女人否定女人」的泥淖，劉毓秀決定策略性地暫時撇開、隱藏她的女性主義。

以上是第二段引文的內容。於是，其中的策略便是用國家女性主義包圍家庭父權，但是偽裝在主婦群體被動員起來的身體以及社區運動之內，其後這些群體和這種公民運動必將對公共領域內的性別邏輯造成完全的改變。至於將如何改變、造成什麼樣的改變，則沒有在這篇訪談中提到。

接下來的引文中，一邊描繪著達成政權接管的方式，劉毓秀的

遣詞用字更加地慷慨激昂辯才無礙。這個段落擬想描繪著「吞食」——吞佔公領域和政府部門——的發生，想像著使政府質變為女性化家庭照顧者角色的過程。

我認為，這個非一夕之間而是緩慢踏實地發生的政權接管，其所藉助的這種隱形的操作模式以及來自社會基層和國內各社區主婦參政人數的全面提升，正是一種寄生蟲式的反霸權運作。它的寄生蟲性格在於：盡可能僅僅依附著不但是體制還有意識型態——亦即現代化家庭與民主化國家——既存的形式和制度。主婦社區運動並不去挑戰它們；相反地，如劉毓秀所說，它是在體制之內，經由延伸主婦的角色和功能——從她們家庭的照顧者到社區、社會、國家、乃至世界的照顧者——來運作。它鼓勵女人承擔起她們在家中同樣遊刃有餘的管理者角色，並且在她們的社區內以公民意識的責任感自許，擴大這個角色乃至於參與地方首長的選舉；目標是藉著主婦轉變而成的社區首長慢慢地侵吞政治權力的中心。同時，這個目標的傳播並不明顯地依賴女性主義意識型態；相反地，將個人對家庭和親族的母愛擴及鄰居等等，這種廣受認可的觀念則是被支持鼓勵的。

這種對社會組織和母職母性意識型態既存形式的緊黏不放，正是我所謂的反霸權寄生策略，這個策略，用劉毓秀的話來說，可以成功地滲透到父權社群和國家機器內。劉並沒有興趣建立一個「主婦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以做為國家女性主義的核心；相反地，她在訪談中擴大了主婦的「傳統」角色和功能，把社區和國家含括進來，因而轉變了主婦既有的定義。這樣的轉變／質變要如何達成呢？其一，它需要某種特別的天時地利人和（或許可以稱之為機會主義的寄生）。在劉毓秀專訪的最後一段引文裡，指出了這個天時地利：「在這個時刻選擇從國家女性主義的角度去思考婦運實踐的可能與方

向，和政治環境的變化有很大的關係。〔……〕由陳水扁執政的台北市政府，給國家女性主義……一個上場磨練、舞刀弄槍的機會。」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力量在運作，讓她們能夠操著特定的刀槍上場磨練。這些刀槍的比喻指的正是寄生策略，舞刀弄槍的是被標示為陰柔具母性的、而不太是女性主義者的家庭主婦們，她們身處的戰場屬於宿主所有（父權政府官僚），而此刻的宿主不但一點也不採取防衛，甚至是對這些有點不請自來、頗具野心的客人大表歡迎。

這就是我所要論證的：在劉毓秀將家庭主婦描述成實現國家接管的催化主體時，其中有不只兩層而是三層的無形力量在運作，而透過劉的造詞遣字還有她直接或間接左右的運動策略，這些隱形而不被道破的力量於是得以發揮它們的作用。

只要有足夠的（主婦）身體能在行政和官僚基層聚集包圍政府、吞食政府政權，就能利用併吞的方式實現接管。這樣的計畫，如我所說，可以看作是一種寄生策略。但我的問題還沒解決：如果寄生者做為一個政治鬥爭和質變的關聯體（relational form），可以改變不僅宿主（在這裡是政府）還有寄生者（主婦）本身，那麼這篇訪談的發言主體位置又是什麼？在哪裡？又為什麼這個發言主體位置必須既非宿主亦非寄生者？

這篇訪談的發言主體位置十分明顯地就是女性知識份子。她藉由動員她的讀者理論化並擬想當前的政治和未來的政府重組；這些被動員的讀者與其說是家庭主婦，倒不如說是（年輕）女性知識份子，因此她們才會被說服，進而採取相似位置去支持以主婦為催化劑或先鋒的政治運動。這便是該篇訪談其中的一個影子：不太被承認的女性知識份子主體位置被隱藏起來，以便更能有效驅動轉變的力量。絕不使用女性主義本身的措詞，而以主婦之名之位置來動員國家接管的催化力量，會更好更有效率。這個女性知識份子主體不

玩認同政治，因為那樣會釋放出「差異」這個負面的力量而需要去克服它。（「我並不急著去挑戰她們，〔……〕絕對避免陷入女人之間相互否定的邏輯。」）我會把這個女性知識份子位置稱為含蓄作用的位置，它存在其中，但只做為指導性的影子或力量，絕非具有顯性強制力和逼迫性的身分。

至少在我的閱讀裡從寄生策略中的這個影子（女性主義）謀略釋放出來的指導性力量，再製或緊附並因此動員了兩個可辨的思考和情感架構。其一是參照反對黨藉著贏得基層選舉來包圍中央政府的政治策略，這個戰役的口號已經在近年的選舉中成功地付諸政治實踐。因此，以主婦的身體在地方選舉中包圍政府機器，這種說法是既熟悉又新鮮，因為它在反對政治的策略和實踐中嵌置、攙入了性別政治。

第二個思考和情感的架構比較不容易辨識，或許是因為在政治上「現代」「平等」「進步」的脈絡和性別對立政治的脈絡下，它顯得不調和不一致。（就如同 Dumont 曾提到的，民主有階序性，只是需要被重新分析和辨識。）我會說這是一個罔兩，而它隱匿在劉毓秀訪談中的發言主體位置和國家接管願景裡，在引文的第三段中尤其清楚明白：思考和情感隨著哲學國王（Philosophy King）的棄讓權位給哲學女王（Philosophy Queen）而逐漸增強，在最後一句達到最高點：「讓女人掌握國家權力，成為社會、國家、世界的照顧者。」（劉毓秀 1996）。

類儒家（此外缺乏更好的詞彙，這裡指的是曖昧不確定且可以無限延伸的「亞洲價值」下的「儒家」）之鬼的幽靈，在這裡被呈現在向外輻射的（人）事物新秩序同心圓中，而同心圓的中心有一個女性人物（哲學女王）做為漩渦力，用最審慎的態度激發起改變和質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一則教條的訓令，相關的是（文人或士）個人與政治、自我修養、和治理家國的順序和秩序。我認為，這個

主導了男性文人修身齊己治人，甚而擴展到帝國邊界的幽靈力量，在這裡再度復活，被（又一次）干涉與再塑，以為新國家女性主義者所用。現在很清楚的，女性（作為）知識份子的立場和位置十分重要，因為深植著階序性的儒家思想的確不時且必須便利於某種「民主化」、「現代化」的翻譯，所謂平等主義的精神於是被視為位在層層同心圓中，以一個道德高尚廉直誠實的（重新定義的）文人學者做為中心位置而向外擴散。然而在文人學者（在過去重要的經典正文中，而今則是在個人主義平等主義的論述中）和文盲（在同樣的經典正文中，或是在一個新的權利論述中）之間，至少還有品行和甚至卡斯特（caste）的差異（註 11）。深植在這樣少數人和多數人兩者之間的階序關係之中的情義約束（obligation），正是一種慈愛和藹家長式的照顧，以及以身作則樹立典範式的管理（而非公開明白的訓誨）。到了國家女性主義對於這樣的秩序結構的重拍版本（retake）中，它變成了一種女性的、家庭的和母性的照顧。男性沙文權威仍舊存在，但這次是以女德（feminine virtues）的樣態，存在於以主婦做為首要「學生」和未來「領袖」的動員中。這些主婦的先鋒身體將會被她們之中的影子女性知識份子所引導和帶領。

然而，儘管劉毓秀宣稱想要把權力送到所有女人手中，不管她們是誰（這裡女性知識份子的位置是很清楚的，就是調度權力且代替統治者管理經營的傳統文人位置）；雖然如此，仍然有些女人是想都別想絕對被排除在可能的權力接管之外的。我們可以說，從女性知識份子的發言位置來看，家庭道德價值決定了誰可教和誰不可教之間的界線。含蓄和沈默的象徵暴力下旨規定，不准提——不需要提——那些不可教的被驅逐排除的外人／異類（unteachable outcasts-outsidere）。

4 . 國家女性主義之家的罔兩和影

台灣女人，以及整體台灣社會，無疑應該對滾雪球一般的龐大色情產業明確地、堅決地說「不」。社會一方面必須接納從事性工作的姊妹，並說服、協助她們轉業，另一方面應該動用公權力斬斷性產業的網路。（註 12）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符蛇蚺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註 13）

國家女性主義的寄生策略目標在於完全的吞食，以及以寄生蟲系統的形式來反芻（regurgitating）國家機器和政府官僚體系。在此過程中，女性知識份子的位置是曖昧模糊而含蓄沈默的。佔據這個位置的既非宿主，亦非寄生者，而是了解宿主一如己身從其而出的人，同時她又能擬想與寄生者的結盟以求更有效地引發質變；這個質變既是宿主和寄生者的，也是身體政治和主婦主體位置的質變。而唯一的問題是：這樣反宿主反霸權的寄生政治，如何既已、可能也將繼續在台灣國家女性主義的獨特案例中運作，卻又同時恰好排除驅逐了某些無法辨識的寄生者的生命和運作？例如娼妓（公娼）運動中的那些人，還有某些女性主義者，後者結盟和合作的對象主要不是家庭主婦，而是性邊緣及其他較低的性別階級／卡斯特位置。

1998 年底，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和女性勞工組織發起許多公開抗議行動，包括在市長年度記者會上緊迫盯人緊迫不捨，當然公娼和運動份子都被阻擋不許參加，但她們仍然以戴假髮墨鏡等等方式設

法溜進去。當時媒體真是陷入兩難，不知要把攝影機和報導聚焦市長興高采烈的演講，還是要對準在會場邊和大門外不斷要求對話和兩年緩廢的眾多動作迅速的怪異女性形體。這個抗議活動被取名為「娼影隨形」，戲擬公娼為「蒼蠅」，亦步亦趨騷擾市長，不請自來地要求在市長的餐宴中分一杯羹。這就是不知羞恥不害臊的寄生蟲。

寄生蟲位置和寄生蟲政治並不是某種浪漫的呼籲；也不是挪用 Spivak 所說的底層階級位置（subaltern site）；它有點兒是偎在一旁說話，很接近 Djebbar 所說「旁側依附」（the “para-”）的位置（Djebbar 1992）。如此一來，寄生蟲政治可能會不消開口否認自己或他人的寄生策略和政治，但同時必須面對自己及他人身為女性知識份子之特權階級／卡斯特的矛盾挑戰，隨時記憶起那些太輕易就把寄生蟲拉向且轉化成宿主主體身分（host-body-subject-identity）的力量和情境，因為這些力量和情境會立即同時模糊掉甚至湮滅那些看不見、不可辨的寄生蟲之眾罔兩。這樣或許可以幫助避免太快將自己放在一個無影無罔兩的宿主位置（有鑒於新的進步民主政治），或是打造一間一次將鼠蟑蛛蟻清潔溜溜就能永絕後患的房子；或許也可以先發制人，阻止某種沙文女性主義道德價值，在向上攀升的國家女性主義之家裡，以犧牲剩餘者為代價，來進行國家的轉變和改造。

註釋

1. 這篇論文原本發表於 1998 年 7 月 13 日 -16 日於台北舉行的亞太文化研究研討會，完成於「國家女性主義」成形階段的時刻。
2. <從女人治國到性別解放——以國家女性主義翻覆家庭父權：劉毓秀專訪>，李清如、胡淑雯採訪，胡淑雯撰稿。刊於《騷動》第二期（1996 年 10 月）：20-26。
3. 關於含蓄政治的闡述，以及它在當代台灣文本和性方面的展演，請參考劉人鵬和丁乃非的〈罔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攻略〉，刊載於《性／別研究》3/

4 (1998年9月):109-155。關於含蓄的概念，我們要特別感謝蔡英俊的論文〈傳統中國文學思想中的含蓄詩學〉，發表於1998年6月在芬蘭坦佩雷舉行的「文化研究交叉路口」國際研討會。另外還要感謝白瑞梅、白大維和陳光興與我們持續地討論。

4. Caste，印度的種姓制度，社會階層之意。此處採王志明在《階序人》一書中的譯法。
5. 此處採用，《階序人》，王志明中譯，台北：遠流，1992年，420頁。
6. 《階序人》，王志明中譯，台北：遠流，1992年，420-421頁。
7. 《階序人》，王志明中譯，台北：遠流，1992年，448-449頁。
8. 性別女性主義者是這樣問的：「娼妓能有什麼女性主義主體？我沒看到，也看不出來。」「娼妓怎麼可能在她們出賣勞力的形式裡面擁有我們所謂的『自尊』？」這些問題是出現在1997年底台北某個主要女性主義團體討論此議題的非公開會議中。請參考1999年12月發表於清華大學「性別課程研討會」的〈位移與游動：女性主義教室裡的貓狗蒼蠅〉，其中有對這些問題詳盡的回應。
9. 台北公娼運動1997到1998年間的大事記，請參照〈台北公娼抗爭大事記〉，《性工作：妓權觀點》，台北：巨流，2000年，147-158頁。
10. 原文中“philosophy King”和“philosophy Queen”就是使用英文。
11. 請看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2月。書中討論Dumont提出的階序觀念和晚清男女平權論述，對於晚清譯介民主和男女平權時其中的階序問題有所分析。
12. 劉毓秀，〈向性產業說不〉，文章刊載於《中國時報》，1997年10月25日第11版。順便一提，1870年7月舊金山的排華示威活動中，遊行著舉著這麼寫著的標語：「維護女性權益，拒絕中國婢妾」（Daniels 1988）。謝謝Sherman借我的書。很諷刺但也許並非巧合的，當下台灣反娼女性主義者生產出來的修辭上和政治上的邏輯與效應，竟在結構上與之如此相似（「維護女性權益，拒絕臺灣公娼／性工作者」）。在這樣的陳述下，爭取女權的呼聲反而以兩性平權的面貌再次製造了卡斯特／階級的階序。
13. 《莊子·齊物論》。請參考劉人鵬和丁乃非的〈含蓄詩學與酷兒攻略〉（1998），以及她們的〈閹兩問景 II：鱷魚皮，拉子銘，半人半馬邱妙津〉（1999），其中持續提出另類閱讀或許可以提供不同於二元性別政治的方向。

參考書目

- 丁乃非 (1999) <位移與游動：女性主義教室裡的貓狗蒼蠅>，論文發表於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sian Women's Studies Curriculum，12月，清華大學主辦，台灣，新竹。收錄於本書 405-427 頁
- 丁乃非、劉人鵬 (1999) <罔兩問景 II：鱷魚皮，拉子餡，半人半馬邱妙津>，論文發表於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11月27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
- 李清如、胡淑雯 (1996) <從女人治國到性別解放——以國家女性主義翻覆家庭父權：劉毓秀專訪>，《騷動》2: 20-26。
- 林芳玫 (1998) <當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為例>，《中外文學》，27(1): 56-87。
- 劉毓秀 (1997) <向性產業說不>，《中國時報》，10月23日11版。
- 劉人鵬、丁乃非 (1998) <罔兩問景 I：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性／別研究：酷兒理論與政治》3/4: 109-155。
- 劉人鵬 (2000)《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學生書局。
- Daniels, Roger. (1988)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Djebar, Assia. (1992) *Women of Algiers in Their Apartment*, Marjolijn de Jager (trans.).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Dumont, Louis. (1970, 1979)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Mark Sainsbury, Louis Dumont, and Basia Gulati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階序人：卡斯特體系及其衍生現象》，王志明譯，1992年，台北：遠流。
- Pulkkinen, Tuija. (1998) "Gender and nation". Keynote speech given at the *Crossroads of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 Tampere, Finland, 28 June-1 July.
- Serres, Michel. (1982) *The Parasite*, Lawrence R. Schehr (tran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95) "Acting bits/identity talks". In Kwame Anthony Appiah and Henry Louis Gates Jr. (ed.) *Ident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7-180; quoted in Tuija Pulkkinen's keynote

paper, 28 June, 1998.

T'sai, Ying-chung. 蔡英俊 (1998) "The poetics of reticence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mpere, Finland, 28 June-1 July.